

·新华书店总店编·



书店工作史料

第四辑

中国书店

书店工作史料

(4)

新华书店总店编

中国书店

1990年3月

书店工作史料

第四辑

新华书店总店编辑

*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总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44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定价：3.95 元

ISBN 7-80568-079-5/K·11

目

录

红四军创办的闽西列宁书局	涂树祯 (1)
川陕苏区工农书店记略	冯 石 (3)
党在东北的最早联络站——哈尔滨书店	韩有谟 (5)
党中央在保安的出版发行活动	赵生明 (6)
哈尔滨“开明书店事件”	平治国 (11)
廖释感烈士与晓东书店	刘绍沛 (15)
川北巴中的辅仁书社	冯 石 (18)
军事联络站与潼南书店	青尔祺 (20)
播火者的足迹——记王忠生书摊	平治国 (23)
吴玉章与旭声书店	陈洪府 (28)
三十年代生活书店的批发业务	邵公文 (30)
三十年代生活书店的进货工作	周保昌 (34)
回忆重庆新华日报图书门市部	管佑民 (37)
中央发行部琐忆	梁方庵 (44)
开明书店及其经营特色	王久安 (47)
清代以来的北京书业	宗 时 (57)
北京市书业公会始末	刘玉铮 (67)
湖北崇文书局始末	方振益 (71)
清末以来武汉教科书发行演变	舒兴文 (75)
大连市书业史略	欧 平 (79)
安东诚文信书局始末	董 俊 (85)
北平东西商场书肆记略	雷梦水 (88)
抗战时期的昆明书业	豆稚五 (93)

书店工作史料

(4)

新华书店总店编

中国书店

1990年3月

目

录

红四军创办的闽西列宁书局	涂树桢 (1)
川陕苏区工农书店记略	冯 石 (3)
党在东北的最早联络站——哈尔滨书店	韩有谟 (5)
党中央在保安的出版发行活动	赵生明 (6)
哈尔滨“开明书店事件”	平治国 (11)
廖释惑烈士与晓东书店	刘绍沛 (15)
川北巴中的辅仁书社	冯 石 (18)
军事联络站与潼南书店	青尔祺 (20)
播火者的足迹——记王忠生书摊	平治国 (23)
吴玉章与旭声书店	陈洪府 (28)
三十年代生活书店的批发业务	邵公文 (30)
三十年代生活书店的进货工作	周保昌 (34)
回忆重庆新华日报图书门市部	管佑民 (37)
中央发行部琐忆	梁方庵 (44)
开明书店及其经营特色	王久安 (47)
清代以来的北京书业	宗 时 (57)
北京市书业公会始末	刘玉铮 (67)
湖北崇文书局始末	方振益 (71)
清末以来武汉教科书发行演变	舒兴文 (75)
大连市书业史略	欧 平 (79)
安东诚文信书局始末	董 俊 (85)
北平东西商场书肆记略	雷梦水 (88)
抗战时期的昆明书业	豆稚五 (93)

日伪统治时期的“满图”与“满配”	高 恒 (98)
自贡“战时书报流通处”	陈洪府 (101)
荣昌地下党办的光明书店	吕 波 (104)
中共温岭县委地下联络站	
——太平镇消费合作社	李子根 (106)
河套地区的西北书店	高子俨 (107)
丰都地下党的文化书店	傅 杰 (109)
回忆丽水浙东书店	孔望光 (111)
生活、新知书店抗战初期	
在金华的出版发行活动	申屠麟 (113)
广西融县七七书店	韦凯章 (118)
地下党创办的北流书店	李名魁 (121)
从成都明华书店到联营书店	倪子明 (123)
诸莒解放区“肩膀上的书店”	白萍生 (133)
中共西昌地下组织领导的进修书店	戴剑萍 (136)
回忆渤海新华书店及其二分店	傅玉颖 (144)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书报摊片断回忆	汪其宏 (150)
记西川书局及其所属七家县镇书店	傅登瀛 (153)
正中书局沈阳、长春分局始末	孙含光 (161)
冀中的文化书店	张尔驹 (165)
记北满地区第一次书画下乡活动	韩有谟 (169)
冀晋区新华书店的片断回忆	赵金明 (173)
忆北满光华书店	朱晓光 孙家林 (176)
忆土改时的图书下乡活动	董 俊 (183)
哈尔滨兆麟书店	韩有谟 (186)
三联书店在台湾——回忆台北的新创造出版社	曹健飞 (189)

东北书店初期的社会活动	韩有谟 (193)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琐忆	沈志刚 (199)
从香港三联书店到广州三联书店	韦起应 (202)
回忆新华业务讲习班	王律生 (206)
回忆东北书店长春分店生活片断	裴治国 (209)
回忆区乡干部代销书刊的前前后后	王 庚 (211)
西子湖畔的明珠	

——记浙江新华书店第一个门市部	王希治 (213)
湖南新华书店建店初期的几项业务活动	田裕昆 (217)
厦门新华书店开业记	须 邀 (221)
四十年图书发行统计工作的回顾	徐明琛 (224)
回顾中南总分店图书中转工作	张忠厚 (227)
忆赴朝战地文化服务队	石玉明 (230)
东北总分店建国初期的四项业务改革	董 俊 (238)
山东私营书店的社会主义改造	王律生 (244)
东北地区建国前后的杂志发行	孙含光 (248)
坚强的文化战士	

——忆抗美援朝烈士、朝鲜战

地文化服务队队员高照杰	石玉明 (251)
回忆五十年代的邮购工作	孙尤才 (254)
回忆任丘农村调查	李俊杰 (256)
舟山群岛的轻骑兵	王希治 (262)
熟悉书是最主要的基本功	

——忆三十年前的书籍讲解会	尤 敏 (265)
忆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书店	李善义 石玉明 (270)
北京私营古旧书业社会主义改造记略	周 岩 (278)

发行事业史上的早产儿——公社书店	张昌华 (281)
在“鸡鸣三省”卖书的岁月	李昭文 (288)
一桩公案的真相	
——北京发行“评海瑞罢官”一书的始末	张 治 (293)
“在劫难逃”的进货员	尤 敏 (296)

红四军创办的闽西列宁书局

涂树禎

1927年9月6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等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军来到汀州城（即现在的福建长汀市），十分重视印刷发行工作。当时设在汀州城内的毛铭新印刷所和碧春楼印务局，经过党做工作，为起义军赶印了大量标语、传单，如《告民众书》、《告绿林兄弟书》和《告商人和知识分子书》等。

1929年3月至1930年6月，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先后四次攻克汀州城。每次攻克汀州，都在地下党领导的毛铭新印刷所，日以继夜地赶印各种文告，如《红四军布告》、《十大政纲》和党的《六大决议案》等。毛泽东在百忙中亲自写稿、校对，甚至具体安排印刷、发行事务。

1930年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红军不断壮大，红色区域不断巩固、扩大。为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需要，1931年春，成立闽西列宁书局。同年11月，红四军再次攻克汀州城，闽西苏维埃政府随之迁到汀州城。不久，闽西列宁书局正式在汀州成立，主要负责书籍、报刊和传单的包装、分发工作。书局先设在城区十家街毛铭新印刷所内，以后又迁到水东街大井头汤锦发货店。书局由詹孝光（中共党员，广东人）担任主席，工作人员有雷元（中共党员，上杭才溪人）等三四名。党政军机关的文告、学习材料、苏区学校的识字课本、红军用的医学书籍等都是在毛

铭新印刷所印刷，由闽西列宁书局发行的。如《社会主义浅说》、《纪念我们的马克思》、《看图识字》、《识字课本》等，还印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现长汀县革命历史博物馆还陈列着当年闽西列宁书局发行的马克思像和列宁像，是用宣纸印刷的，白纸红墨，线条清晰，形象逼真。

1931年冬，闽西列宁书局和毛铭新印刷所，接受印刷发行共青团中央苏区机关报《青年实话》的任务。《青年实话》报先后由陆定一、魏挺群担任主编，宋任穷、陈丕显、何凯丰、王盛荣、冯文彬等经常为该报撰写稿件。每期约发行3万册，32开本，玉扣纸，线装，彩色封面，间有插图，内容丰富多采，由闽西列宁书局按系统内部发行或向民众发行，还传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它是苏区青少年喜爱的读物，对革命战争、苏区建设和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被民众称作“射向敌人的精神炮弹”。邓颖超、陆定一、魏挺群、罗明、冯文彬等苏区党政军领导，经常到闽西列宁书局和毛铭新印刷所指导工作，看望工作人员。书局和印刷所的工作人员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克服困难，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各项印刷、发行任务，受到《红色中华》报的表扬。

注 本文参考资料：《制造精神炮弹的兵工厂》。

川陕苏区工农书店记略

冯 石

1933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解放了川北巴中县。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机关都设在这里。同年8月，在川陕苏区政府机关的旁边建立了工农书店。在苏区的各县、镇设临时发行点，选配义务发行员。

在战争环境下，工农书店主要分发书刊、文件、报纸、课本和其他宣传品。共青团川陕省委《关于青年文化教育决议》第七条说：“省文化委员会出版有很多青年教材及课本，各级学校缺课本，即来巴中城工农书店购买，价格便宜。”

工农书店的发行员，同时又是宣传员、演讲员，属川陕省委指挥。他们常年身背大捆书刊、报纸、布告、歌曲等，送到深山老林，甚至黑夜摸到白区散发。有时晚上还到敌我对峙的火线前沿阵地喊话、散发传单，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当时，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经费统一由财政开支，工农书店无经济负担，书刊、报纸、课本等大都免费供应。烈军属、游击队、贫雇农子女入学，一律不收书籍费，工人、店员入文化学习班，书费由雇主缴纳。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川陕省委一至四次党代会文件等，是工农书店发行的重点书。除此，还发行《目前政治形势和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定》、《川陕全

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的决定》、《军事教育计划大纲》等文件和川陕省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工农书店的报纸发行量比书籍、刊物都大。

发行的歌曲集有：《青年歌集》、《红军歌集》和不定期印发的《工农小曲》等。特别是《一把扇儿连连》这首歌，发行量很大，老少皆唱，至今还在巴中流行。发行的剧本有：《送郎当红军》、《田颂尧自叹》、《慰问》和给俘虏演的《劝郎回头》等。

发行的课本，有列宁小学用的：《初级小学识字课本》、《少先队课本》等；有工农中学用的：《红色战士丛书》、《政治·消息》、《国语》、《算术》、《常识》、《美术》、《音乐》等；有卫生学校和医务训练班用的：《政治保卫队课本》、《看护学》、《药理学》、《生理学》、《本草纲目》、《脉经》、《伤寒论》、《黄帝内经》等。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廖承志（后为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长）亲手木刻马克思像，印发给各级机关单位，甚为可贵。巴中县兴文乡石笋堂吴家大院子曾设过村苏维埃，堂屋正中贴了一张马克思像。红军撤走后，群众贴上“天神榜”予以覆盖，马克思像保存了下来，现存放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工农书店于1935年4月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时关闭。开办时间虽不长，但它出版发行了大量革命出版物，为当时发展川陕苏区，壮大红军队伍起了应有的作用。

党在东北的最早联络站

——哈尔滨书店

韩有谟

1923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领导下，哈尔滨成立了东北地区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哈尔滨独立组。这个组织的负责人陈为人，是李大钊派来哈尔滨从事建党工作的。

1924年，中共哈尔滨独立组，在哈尔滨道外裤裆街（现天一街和水晶街交接地）开办了一家书店，取名哈尔滨书店，作为党地下活动的联络站。这个书店是东北地下党组织最早建立的书店。

书店负责人叫秦墨林，工作人员有平时看门的老崔等人。店内陈列一般图书，也秘密发行党中央创办的上海书店出版物。1925年5月，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成立，吴丽实任书记。1926年4月，特别支部撤销，成立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吴丽实仍为书记。这期间，哈尔滨书店一直是党开展活动的联络站。如1926年8—9月间，团中央东北特派员尹才一从大连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就是通过哈尔滨书店的老崔，找到了在哈尔滨店员联络站（共产党外围组织）中担任团支部书记的纪锦章和团的混合支部书记高洁心的。尹才一找二人谈话，赞扬《共产主义ABC》是一本好书，鼓励二人要认真学习。

1926年10月，奉系军阀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哈尔滨书店被反动军阀的爪牙查封。

党中央在保安的出版发行活动

赵生明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就注重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建立机构，积极开展出版发行工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正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关头。毛泽东及时指出：“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培养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①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在张闻天指导下，中宣部组织李华生、刘伟文编写了《党员识字》教材，油印出版后供干部学习。

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撤离瓦窑堡。7月3日，迁驻保安（今志丹县）。这时，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以保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临时首都。中央机构作了相应的变动（开始曾用过“西北中央局”名义，后用“中共中央局”）。在瑞金时，苏区中央局履行中央职务，领导全国工作。到陕北后，改称西北中央局，继续领导全国工作。西北中央局设中央宣传部，部里设中央出版局，吴亮平任部长（不久，由总书记张闻天兼任部长，吴任副部长），廖承志任局长。^②中宣部直接抓出版发行工作，尽管当时困难很多，但出版工作还是逐步开展起来了。

在瓦窑堡创建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后改名为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迁保安后，要开课

学习，没有课本。毛泽东就在窑洞里日夜奋笔赶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作课本，写成一章，讲一章。

与此同时，红中社也随同迁到保安。《红色中华》是党中央机关报，向仲华任社长。就在两孔红石窑洞里紧张工作，使中断了20多天的《红色中华》报当天（7月3日）就和读者见面了。

党中央加强了群众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宣传队，书写宣传标语。当时，印刷书报困难极大，既缺纸张，又无印刷机器，更无法从外边运进。就连写收条的纸都没有，通讯员送给首长的文件，首长就在通讯员的手心上写个“收”字，算是个收条。

为了解决纸张问题，中央发动群众，利用山区的天然资源，自己造纸。造出的纸又黄又厚又脆，纸上布满米粒大的疙瘩，字印不上去，或只能印半个字。质量虽差，但是可用。没有印刷设备，就用缝衣针代替铁笔，用棉花、破布卷代替油滚子，用烟灰制造油墨，把麻纸刷上桐油，造出土蜡纸。就这样自刻自印一些简单的“毛边”宣传小册子和小报。印刷只能用油印或石印来代替。书报用粗麻纸印，有时也用白纸或土纸印。这种土纸是用黄黑色马兰草和麦秆制造的。

由于当时纸张紧缺，有些书报只能靠流动图书馆进行传阅或者托人从外地购买，或者从敌人手中夺取。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中国红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写信，说：“（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10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10天寄一次。”^③接着，10月22日，毛泽东又致函叶剑英（在西安做统战工作）、刘鼎（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说：“要买一批通

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10种至15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诒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50部，共价不过100元至300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11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并要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来。”④

靠外面购买书籍还不够，就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秘密购买，在解放了的村庄搜集或在部队中征集。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给各部队发电报，给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征稿。信中分别写道：“现有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9月5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⑤

9月13日，中央局宣传部和红中社在《红色中华》第300期纪念特刊上刊登了《把发行工作健全起来》的指示，要求：“（一）在地方党省委（工委特委）内设立‘红中’发行分所，由党的宣传部领导进行工作；（二）在红军中由军团政治部设立发行分所（独立军与军团同）；（三）地方上每区保障有二份，红军中每连有一份，均由发行分所发给。”